

《纽约时报》 权力的跷跷板

(一)

二十世纪以美国作为世界上无可匹敌的超级大国而结束。在二十一世纪，美国军事力量保持霸主地位的同时，财富和信息的“软实力”有明显地转变——前者在于东方，尤其是中国，而后者在于一种新型的跨国即时信息和交流网络领域。

约瑟夫·奈、丹比萨·莫约和·马凯硕贡献了许多精力，对这些变化进行专业地研究。奈是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的教授和前任院长，他在1990年创造了“软实力”这个名词。此后，他继续探究了这个课题，一直到近年来出版的《权力的未来》一书。莫约是一位出生和长大在赞比亚的经济学家，她在2009年以《无助的援助》一书震惊了发达国家。由于非洲传统援助的误导性和有害性，《无助的援助》是对其的一种控诉。现在她又开始着手写关于西方世界的《迷失的西方：五十年经济败笔——与未来的艰难抉择》。马凯硕以前是一位新加坡外交官，现在是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的院长。他曾写过许多关于他返回亚洲到它本来的地方，在世界历史的“中心位置”所看到的。

他们都因赦基·施梅曼组织的会谈在伦敦遇见，而施梅曼正是这本杂志的编辑。

赦基·施梅曼：你们似乎都赞同一种巨大实力的转换正在世界进行，美国也许将不再继续它的霸主地位这类宽泛的措辞。莫约博士，这对于世界意味着什么呢？

丹比萨·莫约：如果你问：在全球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这个整体中发挥更多作用是否对这个世界，对其他的国家、其他的区域更好。我认为答案是肯定的。几十年里，当然也在我的一生中，人人都去美国和欧洲为援助项目提供资金、提供关于经济、社会政策应该如何制定的指导。这大多数都有效，但在世界上有许多地方——例如，我自己的大陆非洲——在那里这还不是十分奏效。

人口统计学预测我们在未来的三四十年里将有九十亿人口，而对此我们将措手不及。中国和世界上其他许多区域将会需要越来越高的能量产品和其他产品的消费，我们对此也没有做好相应准备。除非我们想要在矛盾中结束，不然我们就需要放弃一些东西。西方人将必须牺牲一些东西。

施梅曼：马凯硕教授，您似乎对东西方的调平表示欢迎，这就是正在发生的吗？

马凯硕：我想说的是，美国将继续做得好——世界希望美国做得好——但是在之前两百年来，美国和西方所享受的惊人的世界霸主地位是一种非常人造的历史时刻。在之前两千年中的一千八百年中，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一直是中国和印度。因此，至2050年或者更早，第一大经济体将会是中国，第二大经济体将会是印度，第三大经济体将是美国——这才是事物发展的正常体制。

这大体而言是一件伟大的事情，原因有：第一，几十亿人口将从绝对贫乏中被解救；第二，你将会看到一个转折，在某种意义上，向正常状态的转折。当你与世界上其他地方面对面地表现不佳，如中国和印度，你会失去你的自信，你会失去你的幸福感；这就是为什么十万英国人能够不费力地统治三亿印度人。一种亚洲文化复兴将会是二十一世纪将要发生的重大事件。我认为这将是一个十分令人兴奋的新世界，这应该对我们所有人更好。

约瑟夫·奈：我在书中描述到：在这个世纪有两种巨大力量正在转变。一种是西方向东方转变，对此我赞同。在工业革命之前，亚洲有世界一半多人口和产品，并且在二十一世纪中叶，亚洲将返回到你所说的正常均衡状态。

但第二种转变十分不同，我不认为我们已经有足够的研究来解释它，即从政府中转移出去，东方或西方，向非政府行为者转变，这是由信息革命所驱动。当我思考世界权力的分配时，我想到二两一种三维棋盘。顶部棋盘是军事力量：我认为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我也觉得它将会在几十年里保持这种状态。如果你去第二个棋盘，即国家间的经济实力棋盘，世界便是多极的。如果你去最底端的棋盘——跨国关系，政府控制外的东西——权力被混乱地分配，并且这就是权力扩散的来源。你有资金和资源储备的流动问题，这比大多数国家的预算还要大。你不仅有恐怖分子问题，你还有网络恐怖分子问题，他们呆在家里并向国外发送电子信息，而你对他们来自哪里却不了解。你有气候变化问题，你还有流行疾病问题。

在这些领域，这都不是东西方世界单独的问题。除非东方和西方——和南方——合作，你不能独自解决这些问题。你必须使用软实力和硬实力去创造网络体系和机构，如果你问什么国家是创造这些的最佳地方，我想这还是美国。因此，我认为美国将会继续是保持最强大的国家，但这将是一种不同类型的力量。

（二）

莫约：我认为这还没有定论，如果我用陈词滥调，在某种意义上，较广泛的国际团体重视机构不再那么明显，而这种机构是美国以几十年前他们所提供的方式提供。像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类机构，之前他们所有的庄严举止已不明显。世界上的国家仍然如之前我在赞比亚时他们所做的那样渴望能像美国一样，这对于我来说，并不十分明显。

我认为西方国家错过了一个计谋，因为它采用了——当然在非洲和许多贫穷的经济体里——一种“做我们所说的，而不是我们所做的”的态度。整个激励的想法已经成为西方经济体里成功的脊柱，它不是西方移植到像非洲这样国家的东西。非洲经济发展的通路已经集中在援助上；它已经集中在某些人所称的“获得性依赖”。

那只留下了非常不愉快的回忆。从经济方面看，许多国家——不仅仅是非洲，还有巴西、智利——现在转向中国。中国给予了他们一个销售农产品的真正机会，而这曾经被西方通过补贴程序的方式关在门外。这是美国非洲做贸易的机会，也是解决经济发展难题的关键点。十亿人口的大陆曾经还没有全球贸易的百分之二。

西方的新闻界将会说，“天啦！中国突然袭击非洲。这是殖民主义。非洲将会被虐待。”但是这比那有更多的细微差别。人们不相信美国对非洲的福利感兴趣，也许除了少数的慈善会和给一些援助资金。人们不会真正地相信美国对增加非洲的就业和创造长期的可持续经济增长感兴趣。

马凯硕：让我解释一下一个关于美国的十分特别的观点，这来自乔所说的。再一次，我经常强调美国对世界起的积极作用比消极作用多。但在同时，认识到美国的软实力是现今世界我们看到的最快的收缩型泡沫，这点很重要。这是西方在世界上霸主地位的人造历史时刻的一部分，但那软实力正在迅速地消散。

如果你从美国在人权上所拥护的方面看，你就已经从苏联创造的古拉格时代到了美国创造的关塔那摩时代。你已经看到美国在加沙发生的可怕事件上保持沉默。当副总统戈尔告诉每个人，“注意二氧化碳的排放，”他能教育全世界，但不能教育他自己的人民。

当尘埃落定，当中国成为第一经济体，而印度成为第二经济体，他们将不再只是袖手旁观和被动地接受美国为世界制定的所有规则。似非而可能的是，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比美国更是做好了准备去迎接美国自己制造的全球化。

奈：虽然和我是好朋友，但我也碰巧不赞同他的观点。我赞同某些倾向，但我认为他过度夸大了美国软实力的衰退。事实说明这正好相反。看英国广播公司近期关于不同国家吸引力的民意调查，你会发现美国排在中国之前。胡锦涛于2007年在中国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表示，中国需要在软实力方面投入更多。他们已经在孔子学院、创造中国半岛电视台和其他的项目上投入了几十亿。但对于中国来说，问题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来源是国内社会，而不是它的政府，可中国不能放纵它的国内社会。

（三）

为什么印度宝莱坞在国外销售这么多电影，而中国却没有这样做？这不是因为印度演员和导演比中国的好；而是因为中国有审查官。中国在上海举办了一个壮丽的博览会，我去观看过，也很喜欢。之后，中国关押了刘晓波，这削弱了自己的软实力。如果你看芝加哥委员会所做的关于全球事务的民意调查，或者是我之前提到过的英国广播公司做的调查，你会发现中国软实力没有增长，而美国软实力却有所增长。因此，我只认为事实和肯肖尔极好的全方位概括不一致。

我们都赞同的一点是，美国必须把精力倾向于气候变化。但冰冠融化不仅仅因为一百年前发生的事，而因为现今我们向大气中排放的东西，对此，中国已经超过了美国。我们——指中国，美国，印度和其他国家——必须要减少我们增长的碳强度，这就是我们能合作努力，而不是竞争的领域。让我告诉你：如果喜马拉雅的冰川系统融化，中国的河流停止流动，忽略美国所做的，这些对于中国和印度，将是非常有破坏性的。

马凯硕：我几乎已经在亚洲度过了我的一生。我发现了一个悖论：如果你问大多数人他们想送自己的孩子去哪里上学——例如我的孩子——他们全都送自己的孩子去美国。例如，如果你去中国，你见到了市长或其他人，他们获得了美国的大学的学位。但这

自相矛盾的同样是，如果你去周游世界，那些对美国政策和双重标准起最关键作用的人都是受美国教育的亚洲人或非洲人。

莫约：我能不能这样说，我爱美国，请别误会。

马凯硕：我也爱美国，但这是美国的政策。自相矛盾的是美国已经丢失了听取意见和理解这些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的能力。他们假设美国能继续指责中国。美国将会说，“请做个对世界负责任的参与者，”推断美国是一个对世界负责任的参与者。但是世界上其他的国家能够看出，美国真正给世界其他国家的援助，以及中国给予世界其他国家的援助和损害。

对于民主来说，我确实相信中国终究会走向民主，这没有别的选择余地。如果你将创造全世界最大的中产阶级，并且你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营他们，这将是行不通的。问题出在时机，而非目的。要记得的关键点是，从中国人的角度看，这在中国是个人自由的爆发。仅仅三十年前，中国还不能出游海外。而今天，每年有四千万中国人到国外旅游，并自由地返回到中国。

奈：实际上，我赞同肯肖尔的观点。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将会改变，我认为他也纠正了一点，这将要花费很长一段时间。前美国驻中国大使芮效俭曾说过，“现在有比之前任何历史时刻都多的中国人自由了，但中国不自由。”这个关押刘晓波和艾未未的国家不自由。问题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将怎么改变。随着中国的改变，它将更能够运用国内社会，更能够发展它的软实力。因此，让我们期待它发生。

让我补充一点，我很赞赏中国在经济上所做的。供养四亿贫困人口是一项极大的工作，但请记住中国面临着许多问题。其中一个将是人口统计学的。对于劳动力的新参与者而言，计划生育政策正在引起一种从2015年开始的反向的人口统计学金字塔。正像中国人所说的，他们还没有变富有就已经老了。他们也将必须面对国家升高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以及减缓的增长率。他们不再去摘容易摘到的果子。中国还没有解决政治参与问题，所以将来还会有一定阻碍。

（四）

让我们暂时回到中国的对外行为，借用我认为很重要的丹比萨所说的，我们应该欢迎中国购买非洲的商品。如果这会增加非洲的收入，这将是件好事。这是一种在非洲的特别类型的中国行为，为此我们很担心。当世界银行官员或欧盟官员进来说，“不，我不会帮你建一个体育馆，因为你们用这些涉及扶贫的钱做些事情更重要，”而非洲国家会说，“不，谢谢。中国人已经为我们提供了体育馆，并为总统开了瑞士银行的账户。”这对削弱有效制度的发展有着不利影响，而这正是非洲真正所需要的。我担心中国涉及腐败的行为——而不是它正在抢购的商品。

莫约：如果您不介意，我可以插句话吗？我将举一个我十分惊讶的民意调查例子——2007年皮尤调查。他们去过十五个国家，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在非洲，他们问非洲人，“你们怎么看待中国人？他们与美国人比谁好？你们喜欢他们吗？你们认为他们做得好吗？”一向有很大悬殊——我说的是整个大陆的百分之八十五至九十、九十五

的非洲人说，“我们爱中国人。他们做得很好，他们不完美，可他们比美国人好，他们在传送他们所拟的日程。

我赞同你的观点，没有谁是应该支持一个制度还不完善、存在严重腐败的计划。然而，我真的不相信我们应该依赖传统援助机构和发展机构，而成为那些经济体中的传送物品或提供服务的国家。我认为这是使非洲经济发展落后的一个问题。

美国和西方模式存在的问题是它必须允许非洲政府放弃他们的职责。我们理清头绪，搞明白腐败很重要，但最终确定遵守劳动法、处理环境问题以及我们不以腐败的环境而结束，这是非洲政府的职责。

我们不会打击非洲的腐败，除非我们在非洲有能够负有解释义务的中产阶级。因此，这是一种“鸡和蛋的问题”。中国人提供的不一定是理想的，但这却肯定是增加就业的好前景，比传统发展机构提供的要好。

当人们喜欢刘晓波被关进监狱时，我知道人们会失落的原因。但在同时，我们必须多谅解。中国人有和世界其他地方非常、非常不一样的背景环境。

马凯硕：如果你客观地看它，世界上最大的权利应该始终着眼于世界上最大的新兴力量。这是一个合乎逻辑的事情。因此，美国应该花费 90% 的资源在中国。相反，美国花费 90% 的时间关注伊斯兰世界，与伊拉克和阿富汗进行不必要的战争。与中国打交道，当然，意味着将中国融入世界。当美国醒来时面对中国的现实时，中国将强大到美国无能为力。

现在在伊斯兰的世界里发生了什么，西方对阿拉伯春天运动报道说，“很伟大吧，那里有民主。”很少人注意到，下台的两位领导，突尼斯的本·阿里和埃及的穆巴拉克之所以能从政 30 年是因为他们受到西方权力的支持。事实上，这些统治者的下台是西方权力瓦解的动态。我们仍然不知道阿拉伯春天运动的结果，但是无论是哪个当权掌控突尼斯或者埃及，他们都不会像本·阿里和穆巴拉克那样亲近西方权力，因为这已不再可能。

（五）

奈：当我们讨论亚洲的复苏，这个词也是我用在我的书中形容我和都同意的，亚洲不是一件事。当你去印度和日本，你会发现很多对中国的恐惧。为什么印度想和美国有更好的关系？为什么日本想和美国搞好关系？是因为担忧中国的这种硬实力的崛起在没有等同的软实力的情况下的方法。

但是，让我们回到阿拉伯春天运动。我认为阿拉伯春天运动不会太影响中国。它不会太影响美国。它会有更多的本土影响，就像丹比萨说的那样。非洲和北非人民想要自己做，我认为这是个正常合理的方向。

阿拉伯春天运动最重要的是它指向注意第二权利转移，是我们没有花很多时间在这上。这种巨大权利的扩散来自信息革命。

如果你在 1520 年前看印度，传统的观点是，你只能在穆巴拉克——独裁者，和穆斯林兄弟会中选择。现在，这个新兴信息革命不仅创造了新的我们在塔利尔广场看到的中间，它提供了 Facebook 和 Twitter 的技巧，使他们能协调行动。

它没有使埃及民主。它并没有告诉我们事情会怎样发展。但他是一个与二十年前截然不同的政治，它是一个权利扩散的结果。

马凯硕：我可以同意你的看法吗？

奈：噢，行了，，别现在弄砸了它。

马凯硕：我其实已经写过这一点：2010 年是中国外交最糟糕的一年。他们在捕鱼船的问题上猛烈地殴打了日本，他们在炮击岛屿事件中失去了韩国，等等。我在与前中国外交官共进午餐时说过：“怎么回事？你们为什么搞的这么糟？”你知道他怎么说？“，写这个；指责中国。”对我来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时刻当一个前外交官告诉我去批评中国，因为它表明，即使在中国，有些事情正在发生变化。

奈：但是他自己不能做这件事。

马凯硕：当然。但是他鼓励我这么做的事实已经是一个事情变化的标志。

施梅曼：我们去哪里？

莫约：在我小的时候，我们只有从上午 5 点到 11 点的电视。我们完全被西方社会所吸引，特别是美国。我们都想去美国，体验美国。

一晃 20 多年了，有很多事情发生在美国，但并不意味着没有心理参透——不只是我，但更多非洲人在这个大陆上。移动电话在非洲的普及率是令人难以置信的。这非常深刻。我认为它有 30% 左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我们一举超越了传统技术很多，无论是标准的电话或使用银行。现在人们正在使用移动电话交易，约占一个医生来到你的村庄的信息等等。所以我很乐观地认为，信息技术将成为转变政治，经济思维的工具。

马凯硕：我对世界的未来十分的乐观。我看到了我的个人生活和我从哪里来的。我来自一居室房子。我们分享一个无冲水的厕所，当我六岁时，我不得不接受一个特殊喂养方案。所以，我成长在一个典型的第三世界国家。我想现在新加坡人均收入比英国高。

我采取的人生旅程，我现在看到被数亿人正在重复着。随着中产阶级增加一倍，你得到的是一组希望和平，稳定的世界秩序的人们。这也是许多在美洲和欧洲和其他地方的人们想要的。因此，随着动态的人类历史在积极的方向发展，我们要做的是如何帮助它移动到积极的方向，消除障碍。到了最后，从现在起 10 年，20 年，你会看到一个比我们今天更美好的社会。

奈：我倾向于在有关国家之间的权利过度乐观的一面。我不认为美国在绝对下降，我认为我们可以把这种相对下降当做是亚洲的复苏。但是对于第二权利转移，信息技术导致的权利扩散，我认为我们了解的很少。而且我认为它构成更大的危险，我们这的没有考虑过这点。我们才刚刚开始考虑网路安全和网路危险，你可以说有些将是好的——例如，塔利尔广场一代——有些却是糟糕的，基地组织可以在没有离开巴基斯坦或其他地方的情况下，通过发送电子跨越国界进行攻袭。我们不知如何回答这一点，我们也不知道它将如何影响不同的社会。

因此，在一方面我很乐观；另一方面，引用丹比萨此前的话，陪审团还在外面。

翻：孙利勇